

隋文帝时代中央高级官员成分分析

韩 昇

北周末年,杨坚由于周宣帝身边一班机要宠臣的阴谋策划,发动宫廷政变,篡周建隋。捷径给胜利者遗留下的隐忧,深刻而复杂,尤其在人事方面,宫廷政变不像改朝换代的战争那样造就一支久经考验的干部队伍,胜利者只能在旧的官僚中收拢人心,怀柔延揽,这就在两个方面制约了隋朝的用人政策,亦即隋朝只能在北周政权基础上构建新班底,同时又必须清除旧政权势力,仔细平衡各个民族或区域集团的势力与利益。

这种内在的先天不足,往往使得政变王朝的发展深受制约,陈寅恪先生根据北周隋唐三代均出自北周创业集团的事实,提出了著名的“关陇集团”说。所谓“关陇集团”,其范围大概以八大柱国家族为代表,加上十二大将军和其他骨干家族,也就是北周创业集团及其后裔。既然是一个地域性集团,必然具有强烈的排他性,以维持其在统治阶层中的垄断地位,故陈先生在总结从宇文泰到唐高宗三代王朝约150年的用人政策时说道:“但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,仍旧施行‘关中本位政策’,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。”^①也就是说,宇文泰所组建的“关陇集团”成为三代政权不可动摇的基石,其长期垄断政局的内在凝聚力,在于关中文化的同一性和对山东人士的歧视,亦即区域的文化特性及其在人事上的排外性为此集团活力的源泉。

然而,诚如陈先生在《隋唐制度渊源述论稿》中所论证的,周隋之际,制度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革,隋文帝以“复汉、魏之旧”为国

策,采北魏孝文帝以来汉文化成就集大成之北齐制度为基础,兼收并蓄,构建起隋王朝的基本框架。那么,如何解释社会巨变与用人政策的关系呢?就政局的大势而言,陈先生的假说指出了隋唐两代颇带关中烙印的共性,独具慧眼,在其启发之下,如何去把握共性与时代特性的关系?特别是在集权体制下,用人政策关系到政权的性质、政治发展的方向乃至王朝的兴盛衰亡,因此,这里不能不首先对隋文帝的用人作一总的探讨。

二

在隋朝官僚体制下,三师和三公居于官僚阶层的顶端。开皇初,担任三师的有太师李穆、太傅窦炽和太保长孙览^②,至开皇六年(586年)八月李穆逝世,三师未见再设。三公有太尉于翼和司徒王谊,至开皇五年四月王谊伏诛,三公付阙,此后在开皇九年,晋王广任太尉,观王雄任司空,三公为皇室所垄断。^③

① 参见陈寅恪: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,商务印书馆1944年重庆初版,第36、12页。

② 宋敏求《长安志》卷八“南宣平坊”记载:“西南隅法云尼寺,寺本隋太保薛国公长孙览宅”,文中薛国后脱“公”字。长孙览任太保,《隋书》卷五十一本传未见记载。然而,他在北周武帝时已受封为薛国公,宣帝时任大司徒、入隋后,文帝纳其女为蜀王秀妃,结成儿女亲家,以其家世和经历来看,完全可能担任太保,可能《隋书》失载。

③ 张伟国:《关陇武将与周隋政权》(中山大学出版社,1993年版)第128页列田仁恭、柳敏、孙恕、苏威四人为隋三师、三公。然据《隋书》卷一《高祖上》所载:“(开皇元年二月)观国公田仁恭为太子太师,武德郡公柳敏为太子太保,济南郡公孙恕为太子少傅,开府苏威为太子少保”,可知以上四人皆为太子属官,非三师或三公。

以上七人,李、窦、长孙和于均为胡族大姓高门,无须赘论。王氏出自乐浪,自汉武帝平朝鲜设郡县到西晋末年乐浪、带方郡被高句丽所攻克,王氏始终为朝鲜汉人第一大姓,并已带有浓厚的当地文化色彩^①。乐浪郡陷落后,部分王氏迁回中国,辗转于北方各地,王谊一族则“以良家子镇武川,因家焉”^②,因此机缘而跻身于北周创业集团,在此数百年间,王氏早已胡化,完全可以视为胡人^③,而王谊则为北周上层统治集团中支持隋朝革命的代表人物。

由此看来,隋初三师和三公都是胡人,且为北周创业集团成员,在北周的身份地位不亚于隋文帝。他们受到尊重是由于在周隋嬗替中站在杨坚一边,颇建功勋。显然,北周权贵在隋朝的地位,是由其政治立场决定的。但是,由于他们身份地位本与文帝相埒,使得文帝上朝时,一见到这班功高望重的老臣,便浑身不自在起来。开皇元年(581年),文帝要到岐州巡察,王谊劝谏道:“陛下初临万国,人情未洽,何用此行?”文帝笑着回答:“吾昔与公位望齐等,一朝屈节为臣,或当耻愧。是行也,震扬威武,欲以服公心耳。”^④这句暗藏锋芒的戏言,说出文帝内心的真实思想,生动贴切地描述了文帝与北周旧臣的关系,道破隋初用人政策之天机。实际上,隋朝的三师、三公均不管事,外示尊崇而内夺实权,原北周权势集团的功臣被安排于此,则所谓“关陇集团”垄断政治的局面已经发生变化。待到这批人老死诛杀完毕,文帝甚至连这一荣誉职位都不愿再授予人,而改由皇室担任。

三

三省长官为隋朝政治决策的核心人物,文帝时代,其任免情况如下^⑤:

1. 尚书省左、右仆射 担任尚书左仆射的有高颎(渤海人,前朝任内史下大夫,任职于开皇1.2.~1.8.及开皇2.6.~19.8.)、赵芬(天水人,前朝任东京小宗伯,任职于开皇

1.8.~2.6.)和杨素(华阴人,前朝任治东楚州事,任职于仁寿1.1.~大业1.2.)三人。担任尚书右仆射的有赵煚(天水人,前朝任齐州刺史,任职于开皇1.2.~不详)、虞庆则(京兆人,前朝任石州总管,任职于开皇4.4.~9.1.)、苏威(京兆人,任职于开皇9.4.~12.7.及仁寿1.1.~大业3.7.)、杨素(任职于开皇12.12.~仁寿1.1.)。

2. 门下省纳言 担任此职的高颎(开皇1.2.~不详)、柳机(河东人,前朝任华州刺史,任职于开皇初)、苏威(开皇1.3.~10.7.;开皇14.7.~仁寿1.1.)、杨素(开皇9.6.~10.7.)、卫王爽(皇族,前朝任内史上士,任职于开皇7年)、杨达(皇族,前朝任内史下大夫,任职于仁寿2.10.~大业8.5.)。

3. 内史省监、令 担任此职的有虞庆则(内史监,开皇1.2.~4.4.)、李德林(博陵人,原北齐中书侍郎、周御正下大夫,任职于开皇1.2.~10.4.)、赵芬(开皇初)、赵煚(开皇3.4.~不详)、晋王广(皇子,任职于开皇6年~8年)、杨素(开皇10.7.~12.7.)、蜀王秀(皇子,任职于开皇12.2.~13.6.)、齐王暕(皇孙,任职于开皇19.6.~仁寿元年)、晋王昭(皇孙,任职于仁寿1.1.~4年)、杨约(华阴人,任职于仁寿4年~大业元年)。

三省长官中,高颎的出身颇可研究,《北史》本传记其“自言渤海蓊人也。其先因官北边,没于辽左。”所谓“渤海蓊人”云云,似属冒称大姓,真正的出身大概与前述王谊无异,为

① 参阅韩昇:《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》第三章第二节《朝鲜汉人的流徙过程及其组织》,台湾,文津出版社,1995年出版。

② 《北史》卷六十一《王盟传》。

③ 陈寅恪: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上篇指出:“汉人与胡人之分别,在北朝时代文化血统尤为重要。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,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,其血统如何,在所不论”,至为精辟。

④ 《隋书》卷四十《王谊传》。

⑤ 参阅山崎宏:《隋朝官僚的性恪》,载《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纪要·史学研究》六,1956年。

朝鲜郡县的汉族大姓,但高颍文化修养颇深,不宜视作胡人。其父自北齐归周,在独孤信麾下充任僚佐。独孤信落难后,他不怕牵连继续与其女(隋文帝文献皇后)来往,高颍因此得到文献皇后的有力支持,成为隋朝开国首任尚书左仆射。因为其父曾在北齐任职而将高颍归为北齐旧臣系列,显然不合理。

虞庆则“本姓鱼。其先仕于赫连氏,遂家灵武,代北边豪杰。……庆则幼雄毅,性倜傥,身高八尺,有胆气,善鲜卑语,身被重铠,带两鞭,左右驰射,本州豪侠皆敬惮之”,一生因军功显赫,在三省长官中最具有胡族军将气质。

以上清楚在表明,第一,隋政府首脑几乎清一色出自汉族,哪怕将迹近胡人的虞庆则当作胡族代表,也完全不成比例,与北周政府首脑的民族构成恰成鲜明对照^①。第二,其籍贯分别京兆、天水、华阴、河东、博陵和渤海,其中,天水出身的赵芬和赵翼任期短而无实权,故文帝时期的政府首脑人物大致集中在京兆到洛阳一线。第三,他们(柳机和后期的皇室人物除外)都在周隋革命中坚定支持隋文帝,可见隋文帝用人重在政治立场,并不固执畛域之见,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任用李德林等北齐出身者,并随着国家统一的进程而越来越多地吸收山东和江南地域的官人,到了隋炀帝时代,甚至出现重用江南士人的转变^②。第四,他们无一担任北周中央高官者,不是北周政权的核心成员,并且与杨坚有着明显的上下地位差别^③。

显而易见,周隋革命之后,用人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,原“关陇集团”骨干分子已经被请上有名无实的高位。其实,他们早在北周内部多次政治整肃中心意涣散,又由于位高望重而难为新王朝所用,代之而起的是北周中下级官吏,他们对旧政权并无深厚感情和忠诚度,反而对北周末年的政治败坏感到失望。他们年轻力壮,胸怀理想,渴望建功立业,因此,很容易聚集到年轻的改革家杨坚的

旗帜下,试图取得权力,变革现状,实现抱负。他们多为两京地带汉人,受过良好教育,比起孔武有力的关陇军将更有知识文化,其崛起符合社会由乱而治的发展趋势。

我们再进一步考察一下六部长官和禁军卫府大将军的情况。

1. 吏部尚书 担任此职的有虞庆则(开皇 1.2.~4.4.,以内史监兼任)、韦世康(京兆人,前任司会中大夫,任职于开皇 1.12.~7.4.;开皇 13.1.~15.10.)、苏威(开皇 7.4.~9.4.)、卢恺(涿郡人,前朝任东京吏部大夫,任职于开皇 9.~12.7.,以礼部尚书摄)、令狐熙(敦煌人,前朝任司勋、吏部二曹中大夫,任职于开皇九年以后,以鸿胪卿兼任)、牛弘(安定人,前朝任内史下大夫,任职于开皇 19.9.~大业 6.11.)、柳述(河东人,任职于仁寿中,判吏部尚书事)、长孙平(*洛阳人^④,前朝任东京小司寇,任职于仁寿中,以太常卿判吏部尚书事)。

2. 礼部尚书 担任此职的有韦世康(开皇 1.2.~1.12.)、辛彦之(陇西人,前朝任少宗伯,任职于开皇 2 年)、牛弘(开皇 3~6 年)、杨尚希(弘农人,前朝任东京司宪中大夫,任职于开皇 6.10.~9 年)、卢恺(开皇 9.6.~12.7.)、杨文纪(弘农人,前朝任虞部下大夫,任职于开皇中~仁寿 2 年,以宗正卿判)。

3. 兵部尚书 担任此职的有元岩(*洛

① 北周八大柱国、十二大将军中,鲜卑化汉人仅占五分之一左右,前引山崎宏《隋朝官僚的性格》阿罗西魏恭帝三年(556 年)正月至大象元年(579 年)杨坚执政前担任六官的首脑人物计 34 人,笔者对其民族成分略作修正后进行统计,则汉族也只占四分之一左右,且多已胡化。

② 参阅韩昇:《论隋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对隋亡的影响》,《厦门大学学报》1987 年第 2 期。

③ 山崎宏的《隋朝官僚的性格》在统计上述人员的前朝任职时,以北周末年为下限,笔者修正为杨坚夺权之前的大象二年(580 年)五月,因为此后的官职变动,出自杨坚的任命,不足为据。

④ “*”表示胡人出身,以下同。

阳人,前朝任内史中大夫,任职于开皇1.2.~2.1.)、元暉(*洛阳人,前朝任司宪大夫,任职于开皇2年)、苏孝慈(*扶风人^①,前朝任工部上大夫,任职于开皇2.6.~4.4.)、杨尚希(开皇4.4.~6.10.)、郭均(冯翊人,任职于开皇中)、冯世基(上党人,任职于平陈后)、柳述(开皇末;仁寿年间,以内史侍郎判)。

4. 刑部尚书 担任此职的有元暉(开皇1.2.~2年)、李圆通(京兆人,前朝任隋国公府参军事,任职于开皇初〔尚书左丞摄〕;开皇13~15年;开皇19~仁寿4年〔检校〕)、皇甫绩(安定人,前朝任御正下大夫,任职于开皇2.5.~不详)、苏威(开皇3年)、袁聿修(陈郡人,前朝任齐吏部尚书、周吏部下大夫,任职于开皇初)、刘仁恩(开皇4.4.~8.10.)、宇文弼(*洛阳人,前朝任南司州刺史,任职于开皇9.4.~13年)、薛胄(河东人,前朝任司金大夫,任职于开皇19年)。

5. 民部尚书 担任此职的有杨尚希(开皇1.2.~2.5.)、长孙平(开皇2.5.~3.12.)、苏威(开皇3.12.~7.4.)、张熹(河间人,前朝任冢宰司录,任职于开皇7.4.~10年)、庾狄嵒(*代人,任职于开皇年间)、斛律孝卿(*太安人,前朝任齐尚书令、周纳言上士,任职于开皇18~19年)、韦冲(京兆人,前朝任汾州刺史,任职于仁寿3.9.~大业1.5.)。

6. 工部尚书 担任此职的有长孙毗(*洛阳人,任职于开皇1.2.~2年)、杜杲(京兆人,前朝任同州刺史,任职于开皇2年)、贺娄子干(*代人,前朝任秦州刺史,任职于开皇2.10.~3年)、苏孝慈(开皇初;开皇12~15年)、长孙平(开皇中)、杨异(弘农人,前朝任宁都太守,任职于开皇9.4.~12.9.)、杨达(皇族,前朝任内史下大夫,任职于开皇15.4.~仁寿2.10.)。

7. 禁军卫府大将军 担任此职的有杨雄(皇族,前朝任右司卫上大夫,开皇1.2.、9

年任左卫,开皇初任右卫)、杨弘(皇族,开皇1.5.~不详,右卫)、高颍(开皇2年任左卫,开皇5年任左领)、宇文述(*代郡人,前朝任左宫伯,开皇初~9年初任右卫)、李礼成(陇西人,前朝任民部中大夫,开皇7年任左卫;开皇3.2.~3.8.任右武卫)、元胄(*洛阳人,前朝任大将军,开皇元年起任左卫,旋转右卫;开皇中任右卫)、虞庆则(开皇9.1.~9.11.任右卫;开皇9.11.~17.12.任右武侯)、元旻(*洛阳人,开皇11.5.~20.10.任左卫)、贺娄子干(不详~开皇13.7.任左卫)、汉王谅(皇子,开皇13~17年任左卫;开皇12.2.~13年任右卫)、晋王昭(皇孙,仁寿1~3年以内史令兼左卫)、田仁恭(平凉人,前朝任幽州总管,开皇初任右武卫,旋转左武卫)、晋王广(皇子,开皇2.2.起任左武卫;开皇9年领左武侯)、秦王俊(皇子,开皇2.2.起任右武卫)、窦荣定(*扶风人,前朝任忠州刺史,不详~开皇6年任左武卫;开皇3.12.起任右武卫;开皇2.4.~2.8.任左武侯;开皇1.11.起任右武侯)、刘昶(*中山人,前朝任秦灵二州总管,开皇初任左武卫)、杨武通(弘农人,开皇中任左武卫)、独孤罗(*云中,前朝任楚安郡太守,仁寿中任左武卫)、伊娄谦(*洛阳人,前朝任前驱中大夫,开皇1.2.起任左武侯)、贺若弼(*洛阳人,前朝任洛州刺史,开皇2年任左武侯)、姚辩(*武威人,前朝任大都督,仁寿3.2.~大业2年任左武侯)、贺若弼(*洛阳人,前朝任寿州刺史,开皇15年任右武侯;平陈后任右领军)、卫王爽(皇族,前朝任内史上士,开皇1年任右领军)、宇文忻(*朔方人,前朝任豫州总管,开皇5.3.~6.8.任右领军)、李安(陇西人,前朝任少师右士,开皇9.11.起任右领

① 姚薇元:《北朝胡姓考》(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)第62页引《姓纂》十一“河南苏氏”所说:“后魏《官氏志》:拔略氏改为苏氏。后魏恒州刺史苏强,孙武安充州刺史,生顺,孝慈。……孝慈,隋兵部尚书安平公”,据此可知苏孝慈为胡人。

军)、蜀王秀(皇子,开皇 12.2.起以内史令兼右领军)。

六部尚书和禁军卫府大将军的情况,和前述三省长官的情况基本相同。但是,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胡族出身的官员占有相当比例,在六部和军队长官总数中占 36.5%,其中,在兵部和民部尚书中均占 43% 弱,在工部尚书中占 57%,在禁军卫府大将军中占 46% 强。在集权体制下,军队是国家的支柱,被置于皇帝的严格控制之下,先后有十名皇族外戚(占 38.5%)担任禁军大将军,充分体现其重要性,而胡人在此部门占有如此高的比例,足见胡族仍深受信任与重用。胡族在尚书省各部的不同分布,完全由于其文化特长所决定,例如礼部纯任汉人,而工部多用胡人,即可示其一斑。因此,说周隋嬗替乃汉人推翻胡人政权的斗争,不能成立;毋宁说,隋朝纠正了北朝的歧视汉人政策。毫无疑问,隋朝是以汉族为主的民族融合国家。

四

在上述高官当中,出身于原北周地区占绝对多数。然而,真正出自北周创业集团或来自原北方六镇者却实在少见。如前所述,隋文帝上台时对北周皇族宇文氏所进行斩草除根的杀戮,所警戒的就是宇文氏在关陇集团中的影响力,有此深忧,明显不会倚重北周旧班底。实际上,文帝此后政治清洗的矛头,主要就是针对与北周政权有较深关系的上层官员。相反,他着力培养并重用者,则为其亲族、旧部(含其父杨忠)、同学和故友,亦即与其颇有渊源关系又在政治上坚决拥护他的新人。

纵观文帝的经历,在登基之前,仅在保定五年(565 年)担任随州刺史和建德六、七年(577、578 年)先后担任定州的南兖州总管这样两次外任机会,且任期都很短,没有机会发现并培养起自己的干部队伍,其一生基本在关中活动,所熟悉的大多为关中人士,由此决

定了其用人的地域局限性。而且,他没有显赫的政绩军功,这既决定他不会重用那些高望重者,又决定了他缺乏自己的人事班底,就隋朝官僚的家族背景而言,皇室自称其出身的弘农杨氏居中心地位,与皇亲国戚一起控制朝政,此外受重用者为文帝的故旧。人事基础的薄弱,使得文帝不能不在杨氏之外,倚重皇后独孤氏系统的人马,这批人以高颀为代表。当然,隋文帝上台后也尽量提拔一批政绩突出的新秀,表明他并不囿于原来的小圈子。所以。造成文帝多用关中人士的结果,乃由其人事基础薄弱所致。

人事基础的欠缺,使他不敢轻信别人,开皇五、六年(585、586 年)先后发生了王谊、刘昉、宇文忻、梁士彦等开国功臣的背判事件,使他对那些貌似忠诚的官僚更加怀疑。在高度集权体制下,直言敢谏的忠臣往往成为打击的目标,而政治面目掩盖得完美无暇的野心家却飞黄腾达,鱼龙混杂,忠奸难辨。性急的文帝越来越失去了耐心,心里老是提防着朝廷内部出现朋党。

平陈之后,尚书右仆射苏威和吏部尚书卢恺因被人指摘为朋党而免职,隋文帝以此为契机,将中央权力进一步集中到皇族手中,如吏部的柳述(女婿)、礼部的杨文纪(弘农)、兵部的柳述、刑部的李圆通(家将)、民部的韦冲(皇孙齐王暕岳父)和工部的杨达(皇侄),不但六部全为皇亲国戚所控制,而且,出纳帝命的门下、内史二省长官也转由皇族担任,特别是在开皇末年,废立太子的事件造成的强烈冲击,一代良相高颀失势,中枢权力完全为皇室所控制,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平衡被打破,中央集权转为皇室集权,表明晚年的文帝已经不再充满自信了。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为隋朝用人之一大变化。炀帝上台后,虽然缓和了皇室垄断政权的局面,但他转而大批重用南方人士,造成用人上的又一变化,这当然是后话了。

山东和江南人士在权力中心所占比例甚

低,其主要原因恐怕在于统一的时间太短,这些地区官员的政治立场尚未经受考验,文帝对他们还不熟悉,因此还谈不上委以重任的问题。但是,在六部尚书以下官职中,山东和江南人士占有相当比例亦是不争的事实。据粗略统计,北齐出身而转仕于隋者,有:

杨德林、薛道衡、高励、乞伏慧、卢昌衡、李孝贞、魏澹、陆爽、杜台卿、辛德源、樊子盖、刘权、慕容三藏、李譔、源师、郎茂、高构、张虔威、房彦谦、裴矩、刘龙、王劼、刘弘、游元、冯慈明、刘子翊、陆彦师、房恭懿、公孙景茂、何妥、马荣伯、王通、房晖远、刘焯、刘炫、王孝籍、李元操、刘臻、崔儼、诸葛颖、孙万寿、庾季才、卢太翼等。

南朝出身而仕于隋者,有:

柳裘、明克让、柳晋、许善心、麦铁杖、来护儿、周罗喉、周法尚、鲍宏、裴政、柳庄、陆知命、虞世基、裴蕴、姚察、元善、王炯、萧该、袁充、王贞、虞绰、王胄、庾自直、潘徽、耿询、萧吉、许智藏、万宝常等。

他们或者治理一方,政绩斐然;或者在中央部、寺担任副职,虽然不参加高层政治决策,但却负责处理日常事务,亦是要职。李德林长期担任内史令,为重要决策人物;薛道衡和陆彦师一度典选,甄别士流,力图改变隋初用人路线;柳裘助隋文帝政变篡周;麦铁杖、来护儿勇冠三军,屡建军功。至于文化部门,则几乎为北齐和江南人士垄断,异彩纷呈,正因为有此基础,所以在社会文化走向繁荣的隋朝时代,他们就能以文辞才华脱颖而出,攀

龙鳞,附凤翼,扶摇而上。显然,文帝对于山东和江南人士还是能够兼容并包,量才录用。并且,随着时间的推移,社会日益安定之后,他们也越来越多地登上政治舞台,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。

但是,毕竟山东和江南人士出自原来的敌国,要说完全将他们与出身关中的官人一视同仁,却也不现实。开皇前半期,文帝对山东和江南人士明显抱有戒心,而李德林在中央屡遭高颖和苏威的排挤,最后被文帝逐出中枢机构,也不能说没有畛域之见。至于能否将权利之争、地域歧视和帮派壁垒等官场中常见的纠葛,抽象为确定不移的排他性组织路线,尚可研究。

总而言之,文帝的用人,在开皇前期是以助其改朝换代的两京地带出身的汉族官人为中心,融合胡族支持者而展开的,并随着统一的进程而不断吸收山东、江南士人参加,然而,到了开皇中后期,由于多次发生的政治斗争,加重了文帝对百官的猜疑,又由于太平盛世而增长的骄慢、家庭不幸而造成的焦躁失望和老年的偏执等因素,中央集权日益蜕变为皇帝个人专断,形成皇族近臣遍布朝廷要津的不正常局面。过度的集权无助于克服潜在的分裂因素,反而加剧了隋朝内部的政治矛盾。注意内部协调与平衡的组织路线破产,标志着隋朝已露出破绽而面临新的转折关头。

(作者:韩昇,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;责任编辑:谢宝耿)